

顾问 季羨林 高 放
张卓元 李 强

策 划 谷源洋 张克非
陶炳海 张宏发
执行主编 施援平

中国经济 ZHONGGUO JINGJI JINIANBAO 2007

编选 曹子坚 熊庆国
兰州大学出版社

社 会主义新农村：我们有理由期待
中国式管理：修己安人
中国企业家：谁是真英雄
浦东、滨海、深圳：综合改革的“三驾马车”
豪门盛宴：央企十二强收入调查
现阶段中国中产阶级的职业构成分析

F12-54/4
:2007
2007

问 季羨林 高 放
张卓元 李 强
谷源洋

策 划 陶炳海 张克非
执行主编 施援平 张宏发

2007

中国经济年报

持重

编选 曹子坚 熊庆国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7 中国经济年报:持重/曹子坚,熊庆国编选.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1
(年报丛书)
ISBN 978-7-311-02919-7

I .2... II .①曹...②熊... III .经济—中国—2007—
年报 IV .F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3073 号

持 重

2007 中国经济年报

编选 曹子坚 熊庆国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8912613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1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30 千字 印数:1~3500 册

ISBN978-7-311-02919-7 定价:3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出版说明

始于1999年的“年报系列”丛书至今已出到了第八辑，兰州大学出版社以艰辛的劳作履行了“年年为思想者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料库”的承诺。

秉承“浓缩信息精华，关注世象百态，梳理学术脉络，传播思想文化”的宗旨，“年报丛书”通过专题结构的形式把一年内那些闪耀着理论智慧、反映着实践前沿的高水平文章萃为一编，以达到集中审视广大读者所关注的各个领域发展现状和演变趋势、聚焦性记录其轨迹的目的。在年复一年的积累中，“年报丛书”日渐以鲜明的风格、系统的内容和一流的质量，成为具有强大信息辐射力的文化精品，在学界、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2007年版年报丛书适应读者对居住问题日益强烈的关注，在以往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世界政治经济、世界军事、中国教育等七个专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倍受社会关注的人居环境专题。这样，第八辑年报丛书共分为八本，即：《表达——中国文化年报》，由王永强、张堡编选；《惠风——中国政治年报》，由沙永忠、刘亚军编选；《和畅——中国社会年报》，由张宏发、陈建平编选；《持重——中国经济年报》，由曹子坚、熊庆国编选；《归真——中国教育年报》，由张大玲、陶明瑞编选；《居安——人居环境年报》，由董晓峰、侯典安编选；《变数——世界军事年报》，由李维亮、冯涛编选；《较量——世界政

治经济年报》，由冯康波、李宏编选。

收入丛书的文章是编者从2006年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数千种报刊中精选出来的。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既有高层决策者，也有普通老百姓；既有外国知名人士，也有港澳社会贤达。被选入丛书的文章，并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各位作者在有关领域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或许也不能完全反映年度内知识界对相关问题的权威阐释，但它们都传递了对这些问题的最新思考，都是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论证有力并具有很强可读性的好文章。

为了使文章内容更加洗练，观点更加突出，避免背景介绍方面的重复现象，编者对部分文章做了删节或摘要，有的甚至对标题也做了改动，在此恳请原文作者的谅解。因为编者和作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传播知识，服务读者。

著名学者张卓元先生、李强先生、谷源洋先生、季羨林先生、高放先生（按姓氏笔画为序）自始至终关注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无私的帮助；许多报刊社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忱！

为表示对作者创造性劳动的尊重，我们将向文、图作者奉寄转载稿酬，恳请作者与我们联系，告知您的通讯地址。尤其是所采用的少量图片、漫画，由于原报刊上未能注明摄影、创作者，希望这些摄影家、漫画家也能与我们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兰州大学出版社《年报》工作室

邮编：730000

电话（兼传真）：0931-8912613

E-mail: Zongbian@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



目录

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 改革中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声音 / 002
- 利益多元化时代的改革新思维 / 006

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与中国经济学的真谛

中国到底有没有经济学家? / 011

- 顾准：道德的实践者 / 012
- 郎咸平：漩涡中的胜利者 / 014
- 理性看待张维迎 / 016
- 华尔街评出中国十大经济学家 / 021
- 值得关注的华人经济学家排名 / 025
- 中国经济学家究竟做了些什么 / 029

中国经济学家，争论是为了更好地

统一 / 031

-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 032
- 经济学非主流视角：中国社会思潮与理论斗争 / 037

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

- 量化和和谐社会：如何衡量幸福? / 042
- 专家提出和谐社会量化指标 / 043

● 新标尺——国民幸福指数 / 045

● 推「幸福指数」是否适时 / 049

产能过剩：一个新名词 / 051

● 产能“多乎哉” / 052

● 十三大行业产能过剩突出 / 055

● 质疑「产能过剩」说 / 058

能源安全：关键在于提高利用效率 / 060

● 中国的能源与环境 / 061

● 中国GDP的计算与资源消耗的关系 / 066

● 2020年奇迹：能耗翻一番 / 069

金融安全：必须谨慎处理 / 072

● 加固中国金融的防火墙 / 073

● 金融安全重在体系建设 / 076

● 中外资银行「肉搏战」即将上演 / 078

中国VS印度：结论不能下得太早 / 080

● 印度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 / 081

● 印度「崛起」提供的发展模式 / 086

● 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 / 088

新农村建设：大道有形

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有理由期待 / 092

目录



中国企业：成长中的烦恼

- 新农村建设的蓝图与梦想 / 093
- 乡村建设之路 / 100
- 中国『三农』问题百年历史 / 103
- 城市化：要行之有道 / 106
- 仇保兴指出：中国的城市化面临八大挑战 / 107
- 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主张与争论 / 108
- 中国城市化发展存在六大直接的制度障碍 / 112
- 减轻农民负担：依然任重道远 / 114
- 农民负担：反弹隐患堪忧 / 115
- 新农村建设：『五招』除『五害』 / 118
- 农民关心的问题 / 121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126
- 韩日经验带给中国的思考 / 127
- 韩国『新村运动』启示录 / 129
- 党国英：韩国新村运动及对我国的启示 / 133

- 中国式管理：修己安人 / 136
- 激辩『中国式管理』 / 137
- 温元凯谈中国式管理 / 141
- 中国式管理的8大黑洞 / 143
- 国企分红：有充分的理由 / 148
- 国企分红：分多少？分给谁？ / 149
- 市场经济中的公有资产与全民分红 / 153
- 拥有品牌才拥有世界 / 157
- 中国名牌产品评价有关问题 / 158
- 假名牌『盛行』再反思 / 159
- 『中国驰名商标』到底还值几个钱？ / 162
- 『3·15标志』叫停背后 / 164
- 商业贿赂：附着在经济体上的毒瘤 / 168
- 国外怎样治理商业贿赂 / 169
- 反商业贿赂需专门法律 / 172
- 中国企业：肩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双重使命
- 谁是真英雄？ / 174
- 荣毅仁：中国民族企业家的典范 / 175
- 任正非的大是非 / 178



目录

- 严介和：小成在智，大成在德 / 183
- 1834年，中国出过一位世界首富 / 184
- 抖落财富背后的尘埃 / 187

- 『落马』企业家今安在 / 188
- 企业家『落马』五大因 / 192

开放：不仅改变中国，还将塑造世界

我们应该自豪，但更应该保持清醒的

头脑 / 194

- 全面开放是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经验 / 195
- 应认真考虑引资的成本与代价 / 198
- 中国外资产业控制报告 / 200
- 外资并购忧思录 / 206

外汇储备：增长也烦恼 / 209

- 中国保持充足外汇储备更具正面意义 / 210
- 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意味着什么 / 211
- 反思高额外汇储备 / 212
- 对外汇储备认识的几个误区 / 214

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里程

- 浦东、滨海、深圳：综合改革的『三驾马车』 / 216

- 中国三大特区对比 / 217

- 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深圳特区的改革差异 / 220

产业集群：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药方？ / 224

- 产业集群发展遭遇七大『路障』 / 225
-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 226
- 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特征 / 229
- 政府促进产业集群的十大陷阱 / 229

垄断：千夫所指

福利腐败：附着在市场经济上的一颗『毒瘤』 / 233

- 豪门盛宴：央企『十二强』收入调查 / 234
- 人大代表剖析『行业福利』利益链 / 240
- 垄断行业『福利腐败』众生相 / 241
- 电力企业主动降薪：不像是自选动作 / 245
- 电力减薪：你相信吗？ / 246
- 请给电力减薪一个科学依据 / 249

目录



反垄断的真正功能是消除对市场竞争的人为干预 / 250

● 反垄断的调查对象和制裁措施选择 / 251

● 反垄断之争：走出误解与迷信 / 254

房地产市场：不能成为富人的投机乐园

房价的秘密 / 261

● 徐滇庆：要搞清楚房价的真实成本 / 262

● 将『地价』从『房价』中剔除 / 265

● 解密外资炒楼真相 / 269

● 房价飙升：地方政府成疑似『推手』 / 272

宏观调控：『国六条』要落到实处 / 274

● 厘清楼市调控五大疑问 / 275

● 『国六条』短期内不易奏效 / 278

● 如何使『国六条』落到实处？ / 281

● 历史上的三次房地产大泡沫 / 284

任志强：一个诚实得可恨的人 / 287

● 『反面人物』任志强 / 288

任志强：责任还原于政府 / 291

收入分配：谨防马太效应

缩小收入差距：和谐社会的基础 / 294

基础 / 294

● 收入差距还会持续扩大吗 / 295

● 用发展和改革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 300

● 探讨和研究第三次收入分配 / 303

中产阶级：不再忌讳的一个词 / 307

● 现阶段中国中产阶级的职业构成分析 / 308

● 中国『中产阶级』：认识误区与成长因素 / 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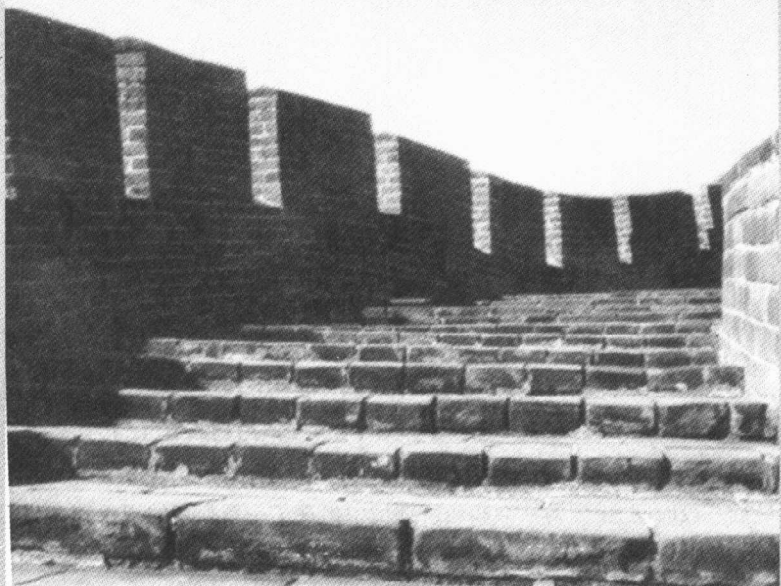
● 个人年均收入多少算中产？ / 315

公平与效率：一个硬币的两面 / 317

● 企业求效率，政府求公平 / 318

● 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 320

● 公平促进效率与长期繁荣 / 323



改革： 依然任重道远

对以往的改革得失进行认真地反思,这正是改革进程所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坚定地推进改革的必要理论准备。对改革的认真反思,可以使改革少走弯路。

——编者



改革中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声音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和变化,显示出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复杂化”:一方面,整个经济增长的状况很好,各种指标体系都在良好范围内运转;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了对改革的怀疑、批评,而且这种声音存在着扩大的趋势。

改革中出现不同声音的社会原因分析

1. 社会利益结构调整进入新时期



近五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说,一轮新的经济利益调整已经开始。中国经济利益结构调整的走向大致是这样的:利益增长首先从少数人开始,从小部分领域和行业开始,然后才能波及整个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调整的时间大致是15年一个周期。改革开放到现在,刚好进入第二个周期的开始,也就是说,少数人利益增长比较快的时期刚刚开始。因此,在本轮利益结构调整中,虽然各阶层的收入都有上升,但上升的速度

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收入增长最快的有五个阶层:非公有经济的经营管理层、完成改革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层、教育文化领域人士、医疗卫生相关领域人士和现代服务业从业者。

通过对这五个群体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利益快速上升的人数比较少。经过测算,这五个阶层在可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不到8%,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进入少数人利益增长较快的时候。对于一轮新的利益结构调整初期,出现这样的现象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很多人不了解这种周期性,也就不能理解这种现象。当他们的利益上升不快的时候,自然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利益上升很快的小群体上,小群体容易受到质疑和非议。

第二个特点是本轮利益结构调整初期的利益上升群体中没有包括政府人士。除了那些腐败分子以外,现在我们政府人士公开的收入增长并不快,这个阶层的收入并没有随着前述阶层收入的上升而上升。如果政府人士不能正确对待这一现象,就会出现两个倾向:一是产生腐败,二是对改革产生怀疑,甚至引发对改革方向的非议。

2. 改革进入负面效应的释放期

改革是需要成本的。任何经济改革,一定有一个正面效应释放期和负面效应释放期。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社会经济中体现的主要是正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还处在积累的阶段,并没有做一个集中的释放。但是到近两年,我们的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的人把这个时期称作“后改革时代”,在这个阶段中国改革的负面效应也开始释放,尤其是在未来两三年内,负面效应会释放得非常快。可以说,中国总体经济改革已经开始进入负面效应的释放期。主要有四个表现:

第一是工人下岗。据统计,国有企业改革导致3000多万人下岗。大规模的国企工人下岗,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创伤,往往容易让人忽视再就业的成果,更容易忽视国企改革后企业效率提高给社会带来的福利。

第二是农民失地。根据现在的统计,每年的失地农民大约有250万至300万人。至于失地农民的总量,据估计大约有5000万。在安置过程中,有一部分农民生活安定,但也有很多没安置好,尤其是通过单一的货币方式来补偿效果不是太好,使得很多农民失地以后的收入下降。

第三是农民工进城。中国现在有1.2亿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建筑业等劳动力密集产业。他们在城市中生存,收入比没有务工的时候要高,但是社会保障跟不上,没有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甚至连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也保证不了。

第四是收入差距。中国的经济利益结构调整一般是从少数人的利益增长开始,然后才能波及到整个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因此出现收入差距是必然的。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很大一部分是二元经济的问题。此外,社会上还非常关注的一个现象,那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

负面效应的集中释放,必然导致负面效应承受者对改革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在享受增长的同时引发对增长的各种怀疑,甚至是对目前整个改革的方向产生怀疑。

3. 改革的走样引发了人们的误解

政府推行每一项改革,必然有它的既定目标,但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够达到它的既定目标。一旦改革的结果偏离了既定目标,或者是过程中较远地偏离了设定的路



径,改革就出现了走样。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走样的改革。比如市场经济改革中,我们希望政府影响企业的轨道,能够由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干预企业行为,转变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间接调节,但是,有的地方改革存在着一些“畸形轨道”:政府一方面希望市场化,一方面却还在继续利用最后的权力;而企业一方面需要搞好和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由此带来一些寻租行为、权钱交易等等,都是改革的走样。

事实上,任何改革都有走样的风险,任何国家中也都存在走样的改革。在改革开始的前20年,大家并不认为改革走样有多可怕,对于改革的走样,是持一个温和的包容和理解态度的,而且是积极采取各种方式来完善它。但为什么近几年,大家突然很严厉地对待走样的改革,尤其是一系列新推行的改革,只要一走样,马上就会有很多质疑的声音,甚至有一些叫停的声音呢?

这主要还是由于人们对改革认知的社会基础不一样造成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层,对于改革的理解是差异很大的。有没有全程经历过改革,能不能从全局观、历史观的角度看问题,对于一个人对改革的理解,会有很大的不同。一些承受改革负面效应的阶层,虽然自身利益也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往往只看到不好的地方,只看到改革走样的地方,自然会有误解。而那些享受到比以往优越得多的物质生活,接受到比以往好得多的教育的年轻人,由于没有经历改革以前的社会,对于改革的评判标准也就过于苛刻,以至于不能冷静对待改革的走样,很容易把改革的走样误解为改革的失败,加深了对于改革的质疑。

4. 政府稳定社会的能力有限

中国政府现在稳定社会的能力有限,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是转移支付的能力有限。转移支付是政府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我国人均GDP刚刚进入1000~3000美元的区间,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时候转移支付的力度不能过大,一旦过大了,国家财政能力可能承受不了;但是不转移支付又难以稳定。

二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有限。主要是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有限,不光体现在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本身,还在于政策供给和制度供给的有限。

三是社会保障的基础很弱。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三大最基本社会保障大部分是有账没有钱,这些钱从哪儿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我们必须正视我国社会保障基础差的现实,一旦对社会保障提出过高的要求,就很有可能给国家带来危机。但是现在社会上各方面的呼声很高,而且人口老龄化本身给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就很大,方向把握不好就容易出现问題。

政府在转移支付、提供公共品、提供社会保障这三方面的能力都比较有限,这三条决定了政府稳定社会的能力不强,也就是说,社会容易出现晃动,对改革的进程也会是一个挑战。

以上便是改革中出现不同声音的主要社会原因,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人



们对于改革的质疑。这些质疑,可以说是改革25年来最为集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如何应对改革中的不同声音

1. 改革的根本方向不能变

过去20多年来,虽然出现过一些波折,但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环境一直都是在改善的,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在各个方面的改革。对于改革的成果我们要充分肯定。可以说,过去25年来改革的伟大成就,正是坚持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动摇的结果。因此,在改革进入新时期时,虽然存在对改革的不同声音,我们仍然要做到坚持改革的根本方向,最起码要坚持四个要点不动摇。

第一,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市场经济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同时,有很多问题,比如权钱交易和腐败,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这些问题一样存在;还有一些市场化的改革走样了,也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总之,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到市场经济身上。批评市场化,否定市场化,对于我们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非常不利的。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有人主张停止国企改革,这是对国企改革根本方向的否定,是很危险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国企改革方向,仍然是“两化”方向:不属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要非国有化;属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的国有企业要股份化,这两化方向绝对不能动摇。

第三,非公经济的发展方向不能动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及理论上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创新,就是承认非公经济的地位和注重发挥非公经济的作用。十六大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一整套的思路。非公经济是必须发展的经济形态,我们必须坚持发展非公经济的总体方向绝不动摇。

第四,对外开放不能动摇。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一个是封闭条件下快速发展起来的。只有全面对外开放,才能享受和利用比较优势带来的优势资源,持续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

2. 不断完善改革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现在改革也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那些不成功的、走样的、带来负面效应的改革,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有可能造成改革的停顿,引发社会经济的动荡,这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警惕,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具体到改革的过程中,应当适当地完善改革。

回顾过去25年,我们没有一刻停止过改革,也没有一刻停止过完善改革。完善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克服改革中的问题,消除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稳



定社会。中国的社会从来都是稳定压倒一切,在改革负面效应释放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的时候,首选目标必然是稳定,也就必然会出现调整改革方向的尝试,很可能会牺牲部分改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通过完善改革来稳定社会,继而进一步推动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继续提供强大的动力。

在完善改革方面,尤其要加强社会体制改革,加强公共品的提供。只要是涉及老百姓基本生活的,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都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这主要是由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与老百姓的利益直接相关,如果改革没有改好,首先受到质疑的必然是这几个领域。当然,我们也还有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也迫切需要完善,比如政治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

当然,完善改革是在已有的体制框架之下,在进一步的发展和改革过程中来完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将改革停止下来进行治理整顿。这主要是由于现在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发展中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需要停下来解决的问题。一旦改革出现了停顿,就可能错过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并且很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引发社会经济的全面倒退。因此,绝对不能因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就因噎废食,而应当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努力完善改革。

中国的改革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中,出现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和深层次矛盾,集中体现为一些不同的声音。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我们必须认清问题本质,明确改革方向,将改革向纵深推进,努力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魏杰、吴健,《中国改革》,2006,9)

利益多元化时代的改革新思维

利益多元化:该欢迎还是拒斥

近两年来的“改革反思”在现象上(话语),表现为对市场化改革的强烈质疑,但在



实质上(诉求),却是不同群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伸张:国有企业职工反对产权改革,农村居民抵制基层行政的乱摊派,进城农民工抗议待遇差和无保障,贫困学生要求减免学费,一般居民呼吁保障医疗,想买房者拥护平抑房价……呼吁以至抗议,林林总总,虽多伴有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质疑,但真正的要害都不在“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立场。

更深入地分析一下还能发现,在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之间往往还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例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希望打破城市中既有的种种政策限制,使自己和家人在就业、工资待遇、定居、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等方面享有与城里人相同的待遇。但对于城市的既有居民来讲,这样的变革意味着自己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意味着基于城乡分割的福利保障将发生于己不利的变化。因而,城市原住民对打破城乡分割的改革缺乏积极性,甚至还有不少人表现出了维持原有城乡分割体制、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迁徙的倾向。诸如此类,可谓不胜枚举。

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宣示,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已经多元化。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了不同的利益要求,他们对各类具体政策和制度的态度已经出现分歧,甚至对立。眼下的所谓改革反思以及与之伴随的种种抗议和质疑,究其根源和实质,乃是不同社会群体表达和伸张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利益多元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结果之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统制所有社会领域,社会各个组成部分(机构或个人)的利益一律与其在这一行政系统中的组织地位挂钩,体现为不同的级别待遇。一旦地位和级别确定,个人或机构的利益也随之明朗。这样的行政统制不承认下级组织和个人在利益上的相对独立性,也不允许下级组织和个人拥有追求本位利益的自由。由此,整个社会中,利益结构单一化,机构之间、个人之间较少有利益的对立和竞争,更少有直接的利益争执和冲突。因而,社会对具体政策和体制的态度也较少分歧。“共识”既易于形成,也易于变更。

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解构了那种相对简单的社会利益结构,并赋予下级和个人追求其本位利益的自由。这一转变既释放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潜能,改善了中国民众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使原来那种内涵相对简单的社会和谐渐趋消亡。可以说,今后的中国社会中,能得到社会所有成员一致赞同的政策或制度在范围上将趋于缩小,而利益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将增多。

利益多元化虽已降临,但中国社会对此却缺乏准备。面对利益结构的多元化,中国社会各界的反映中困惑多于理解,拒斥多于欢迎。然而,利益多元化不仅是以往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动力。因为,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承认它,给它伸张和实现的空间,能激发社会的创造性,推动社会进步。不承认





它,不给它留有必要的发展空间,会压抑社会的创造性,阻碍社会的进步。这一点已由中国近半个多世纪来的社会实践所证实。所以,拒绝或否定利益多元化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中国社会应积极地欢迎利益多元化,并寻找在利益多元化条件下重建社会和谐的新机制。

亚当·斯密认为,社会个体自由地追逐私利能自动地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然而,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斯密的这一论断是不严谨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个体的自利行为所以能增进社会整体利益,是因为有恰当的制度约束使然。离开了一定的制度约束和协调,个体的自发性自利行为不仅难以增进社会整体利益,还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行为泛滥和损害社会和谐的“囚徒困境”。因此,在利益多元化条件下,要想实现个体间的利益协调和社会和谐,必须对个体的自利行为施加恰当的约束和限制。

因此,面对社会中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需要明确一点:凡个体利益,都有其正当性,都不容任意否定;但对任何个体利益都需施加必要的限制和约束,不允许其独大。也就是说,社会既要肯定和保护所有的个体利益,又不能允许任何个体利益凌驾于其他的个体利益之上,更不允许一部分个体对社会利益分配的操纵和独占。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前提,即社会中要存在一个超越于所有个体(局部)利益之上的仲裁者或平衡者。这个仲裁者和平衡者与任何具体的个体利益无关,只负责制定和执行有关社会交往和利益博弈的规则,并对所有具体的利益群体或个人一视同仁。这样的仲裁者通过各种制度规则对各类社会主体的自利行为施加必要的约束,以保障全社会中利益分配的平衡和整个社会的有效整合。

政府:是约束者还是被约束者

眼下中国,说起社会治理和利益平衡,人们一般会寄希望于政府。毫无疑问,中国的政府系统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治理和平衡职能。但应看到,随着我国利益结构的多元化,现有的政府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在治理上的需要。

这首先是因为,现在的政府系统承担着过多的经济发展职能,使得许多政府机构本身成了带有利润最大化倾向的商务性主体。而且,由于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政绩考核和职务升迁)与政府的经济发展绩效密切挂钩,使得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追求经济发展业绩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由此,政府的建设和投资行为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政府的建设和投资是政府履行其经济发展职能的行动,具有公益性;另一方面,因这些项目的成败关系着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也是官员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因而具有明显的私益性。在社会无法有效约束行政权力的条件下,政府履行经济发展职能的行为很容易受官员私益性考虑的左右而偏离公益性,甚至直接侵害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显然,这样的政府很难成为社会利益关系中的公正仲裁者。

不仅如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作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行政管理主体,即使